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清前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唐　英　凯

1996 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又是清朝建国三百六十周年，沈阳冠名七百周年、沈阳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十周年。为此，沈阳市委、市政府、沈阳故宫博物院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庆祝大会，乔石委员长为沈阳故宫博物院七十年院庆题词："宏开历史遗迹，肇启文物精华"，李铁映发来了贺电，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也发来了贺电（函），这些题词贺电（函）充分显示了党和国家对沈阳故宫博物院这座"清朝兴王地、关外紫禁城"的高度重视和深切的关怀。

为庆祝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而举办的清前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96 年 9 月 10 日至 13 日在沈阳举行。参加这次盛会的有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及《清史研究》编辑部、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社科院、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民研所、辽宁大学、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承德文物局、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东陵、清西陵、关外三陵（永陵、福陵、昭陵）的专家学者，以及沈阳故宫的科研、业务人员共一百二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代表们向大会提交了一百余篇论文，内容涉及清前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建筑思想及工艺、宗教信仰、民族风俗民情、文物、图书档案、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真是"高文皆正典，奇宝尽琳琅"，具有较高的整体水平。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沈阳市张毓茂副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在大会上，细谷良夫、斯达里、庞晓梅、戴逸、朱家溍、阎崇年、王俊义、谢肇华、翁福祥、王钟翰等先生为与会者做了专题学术报告。在分组会上，诸位学者以极大的兴趣畅所欲言，深入探讨了清前期文化诸方面。

首先，大家一致认为，由沈阳故宫博物院举办这样一次盛会，对探讨清前期文化很有意义；这个题目涵盖面广，内涵丰富而深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戴逸先生指出，清前期文化可以从多方面阐述，这次会议论文很多从满族崛起、满族文化习俗各方面讨论，这是我们清史研究中的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很重要的问题，应当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对文化变迁进行深刻的理解才能全面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余梓东《论明末清初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变迁》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典型时期，从历史演化的全过程来看，以满族与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变迁构成了当时历史的主要脉络。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而又相互交织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强烈的文化更新和文化创造的需求及动力，出现满族与汉族多向互动的文化变迁，使一度衰落的中国文化再度辉煌——康雍乾盛世，满足了当时文化更新和文化创造的需要。满族何以迅速崛起，入主中原？在文化层面上的特点是什么？这是治清史、满

族史的学者经常思考的问题。戴逸、王钟翰、蔡美彪三位先生一致认为，满族文化继承了女真文化，吸收了其它民族的文化，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和他的特点，而他的很大特点是他的开放性、包容性。戴逸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兄弟吸收汉文化，尤以满族接受最快。如果一个民族用暴力去欺压另一个民族这是反动的，如果民族融合是自然的，自然的渗透、自然的交流、自然的融合，这是进步的。满族能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而且这个政权维持 268 年之久，文化上吸收、融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文化上他不能吸收先进的、其它民族的文化，他的整个文化上的民族矛盾不能消除和缓和，他以后的统治就会很困难。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满族在这方面很成功，这对中华民族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戴逸强调指出，这种文化交流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汉族同样也吸收满族文化来丰富、充实自己。这个问题也要引起充分注意，我们研究清史要看到这一点。王钟翰先生也指出，汉唐文化之所以发达，是处在统治地位的统治者指导思想比较开放，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允许有不同文化进行交流，所以比较发达，有清一代到康乾以后也正是如此。蔡美彪先生指出，清初满汉融合，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满族崛起到努尔哈赤七大恨告天这一阶段，努尔哈赤主要是依附明朝，借明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主动吸收汉文化；从七大恨告天到努尔哈赤疽发背而死这一阶段，他全力抵制明的统治与之对抗，故有意识地抵制汉族文化、更多的吸收了蒙族文化；皇太极时期，为了入主中原推翻明朝，他开始了全面吸收利用汉文化，为自己政权服务。所以除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外，满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应该注意研究和探讨。几位先生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很多精辟新颖的见解，宏观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溯古真涵，稽古鉴今”，使大家很受启发，从而对清前期文化的总体特点和各历史阶段的各自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清前期文化各领域的专题研究方面，与会专家学者在自己擅长专门学科范围内，做出许多深入的探索和论证。

在清初政治文化、典章制度、军事思想、思想文化等方面，朱家溍先生以《故宫藏禁毁书录》为题介绍了七十八种禁毁书。以《博物典汇》为例，以见乾隆时于明末清初人著述禁毁之别，而其所毁者更有褚英事例为他书不载，足见禁毁书中尚多珍贵史料。王钟翰先生《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及满族传统文化》从满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探讨“阿其那”、“塞思黑”称谓的词义内涵与文化根源。阎崇年先生的《辽西争局兵略点评》就明军与后金——清军在辽西二十二年的争局做出理性的论评，认为熊廷弼在广宁之战中的“三方布置策”是一个空泛的兵略，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的“硬拼猛冲”是一个鲁莽的兵略，皇太极在入口诸战中的“远袭掳掠”是野蛮的兵略，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的“轻进顿师”是一个愚骀的兵略。细谷良夫的《围绕尚可喜氏一族的诸般史料》引起大家广泛的注意。王俊义先生《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勾勒了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指出了研究的意义，评点介绍了本世纪研究状况，探讨了研究的启示，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谢肇华先生的《关于原藏沈阳故宫的汉文旧档“各项稿簿”》以日本内藤氏晒兰复印本与在大连图书馆寻见本进行比较研究而认定大连现藏本就是晒兰本底本，从而解决了皇太极时期三部汉文旧档七十余年下落不明、中日史学界多次寻觅而一无所获的遗案。台湾宋承绪先生所著《清初删改“太祖实录”幸存的一页——三仙女故事》认为与其说三仙女为神话，勿宁肯定它是一篇注释满族先世迁徙过程的寓言。台湾翁福祥先生的《清世祖福临与祖制》认为说福临是清朝开创者不为过，世祖遗诏虽名为罪己，实乃留给康熙对许多未纳入制度或未容于制度之依据。佟悦所写《清入关前的爱

新觉罗宗族》分析了有清一代皇族制度的基础。李理《论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在其统一建国战争中的作用》论述了"血亲复仇"口号提出的必然性及作用，而陆海英《努尔哈赤崇天思想及其影响》则论述了努尔哈赤崇天信天思想是其与明争天下的精神支柱、思想武器和理论根据。"帝王图治，必稽古典学"，典学的本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刘玉文《清前期皇帝典学述论》、张爱群《清初经筵日讲的确立和特点》论述了清初皇帝典学的提出、试行、确立、特点及影响。何溥滢《儒学对满族伦理道德的影响》概括了儒学在满族中传播的进程、途经和重大作用。周晓梅《论康雍乾对塞外文化治理》、蒋秀丹《戒得堂与前后戒得堂记》概括了塞外文治的发展与儒学的影响，而张杰的《清前期东北满学的兴起和满文化圈的形成》则论述了东北各族人民学习满族文化、形成满文化圈的历史现象。这几篇论文生动地反映了清初各族文化在多元互动状态下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规律。

在文学、语言文字、艺术、图书档案方面，与会者展开了深入活泼的交流。关纪新在论述《清前期满族文学的嬗变轨迹》中特别强调指出，满族文学的嬗变之路对今天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启示与范例价值。斯达里教授指出："自从1770年，沈阳皇家故宫在欧洲享有广泛的声誉，这需要特别感谢乾隆大帝所写的《盛京赋》"。沈阳故宫唐英凯的论文力求从不同角度探讨《盛京赋》的历史价值。庞晓梅女士则对《盛京赋》中"颂"的部分的满汉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它表现出了进一步发展的满文诗文的特点，满语文形式能够反映出满族语言与诗歌规则两方面的特点。姜舜源认为：清朝纪事诗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有关清史、清宫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晏子友归纳了乾隆御制诗中的"爱物"思想。台湾林佩芬女士撰写的《无名英雄的历史贡献——满族史诗〈西迁之歌〉的研究》提出《西迁之歌》不只成为满族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而且成为研究清史、锡伯满族迁移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具有多方面的贡献与价值。针对台湾学者提出的这个命题，锡伯族学者郭美兰、何荣伟和斯达里都提出了不同看法，郑川水也介绍了他的论文《清初锡伯族的文化特点及其与族源的关系》。

《燕行录》是清代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时所写的纪实记录，记载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状况，约百余种，是反映清代社会的可贵史料。王政尧在介绍上述史著之时，对在韩国所见其中四十种归纳整理、分析，就清代政治、人物、戏剧文化等问题写成《〈燕行录〉初探》，他的论述无疑为与会者打开一扇窗户而引起大家广泛的兴趣。王梦赓的论文阐述了"馆阁体"对清代书法的影响。王爱华在《满汉文化的融合与"档案"词源》一文中提出，满族人由于其特殊的民族习惯将案卷称为"档子"，清入关后，满语的"档"与汉语的"案"合起来形成"档案"一词，最早使用于顺治年间的官方文件，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普遍使用的名词。他的观点，得到戴逸等与会专家的首肯和热情的支持与鼓励。

清初建筑是满汉人民刻划在大地上的历史，对它的研究，一直是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重点课题。支运亭院长的《清前期皇宫建筑风格、艺术的变化和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和井晓光副院长《盛京皇宫建筑文化认识》、王佩环《从"盛京城阙图"的发现及价值看满文研究的必要性》、王成民《北京沈阳故宫彩画异同论》、纪雅萍、周阳生《沈阳清代一宫两陵建筑柱石的类型特点与分期》等五篇论文从微观到宏观，从纵向到横向，对清初建筑艺术特点、体系、文化内涵、文化融合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突破性进展。特别是意大利斯达里教授《关于沈阳故宫修缮1663年满文文件》和郭美兰《乾隆初期沈阳故宫修建考实》、朱淑媛《"盛京城阙图"考略》、周素琴《盛京天坛考》等论文提出了许

多前所未见的新资料，对沈阳故宫今后的古建筑维修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样，关于沈阳故宫的历史沿革、管理机构，佟永功、关嘉录、张虹、何荣伟等人的论文做了准确而深入的研究，使得对沈阳故宫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民族风俗民情事象，诸如宗教信仰、饮食习俗、婚姻礼节、陵寝丧葬、国语骑射、音乐舞蹈等往往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民族的文化属性、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因而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的热点课题。姜相顺等近 20 名学者分别撰文，运用大量史料和发掘资料探讨了清初从宫廷到民间，风俗文化在各方面的特点和满、汉、蒙、藏等民族在近距离多元互动的交流、融合，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述。

文物是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真实记录该时代文化特征的载体，通过对文物的研究去认识历史、文化的发展，是文博单位研究工作的一个特色。台湾毓子重先生的《满族的玉器文化与清代的玉雕艺术成就》认为，在中国五十多个民族里最推崇而普遍懂玉爱玉使用玉的人就是满族，他将玉雕艺术推广于各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玉雕艺术水平最高与数量最多的国度。北京故宫郭福祥专门从事皇帝玺印的研究，以康、雍、乾三帝的印章为线索，探求三帝的心理和行为的共同之处，而这种集体性格正是三帝为保持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儒家思想的有机结合。同样，杨天在《避暑山庄的碑刻及其历史价值》、胡德生《明式家俱产生的时代背景》、周维新《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王鉴仿宋元各家山水册”》、李建华《从几件院藏屏风谈清代屏风的装饰和功能》等文都反映了对文物的研究更注重其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而吕霁虹、李贤淑所著《谈清初瓷器影响朝鲜瓷器的点滴见解》又说明清初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的广泛与深入。

十七、十八世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东渐，中西文化发生碰撞。刘潞所著《关于清初西方天文仪器进入宫廷问题》通过对多重因素的分析，探求需求与引进的关系。承德文物局杜江先生则剖析英使马戛尔尼谒见乾隆这一十八世纪中西方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探求历史的启示。

来自台湾的学者虽然过去与大陆史学界交往不多，但很快融入会议热烈气氛中，他们热情地向代表介绍了台湾清史、满学研究情况。台湾历史文学学会林佩芬女士说，今天的盛京古城城市漂亮发达，关东人民热情豪爽，这里的学术研究水平很高，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两岸相隔这么多年，但是研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认识竟是那样的相近，我们的心灵是那样的相通，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宣传介绍这次大会，也很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在一起交流。

支运亭院长把这次研讨会的特点概括为“规模大、时机好、层次高”，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不少代表还建议再加上一条“友情深”，表明这次学术研讨会不仅为中外学者之间、海峡两岸学者之间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机会，还增进了国内外学者与沈阳故宫博物院之间的深厚友谊，成为清史、满学界值得纪念的一次盛会。